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不断降低，引发了一系列的“唱衰论”，Pritchett & Summers(2014)针对中国经济减速提出“回到均值”的预言，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2023—2033年下降到3.28%；Barro(2016)以条件趋同假说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快速下降到3%—4%；Krugman(1994)认为东亚经济增长基本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却微乎其微，因此必然受到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制约。这些论调受到了理论和现实的驳斥，本文试图从东亚经济体结构变化的启迪入手，研究中国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影响；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之谜”，即资源禀赋变化和结构转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路径轨迹的作用；验证中国国内区域间的大国“雁阵”模式，探索东、中、西部在“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中的所处阶段和结构特点，为延续中国经济结构红利，实现保增长、调结构目标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本文首先从“东亚模式”入手，考察“东亚模式”的内涵特征和外部特征。学界使用“东亚模式”同时概括东亚经济增长的加速和减速历程。“东亚模式”普遍具有如下特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利润为基础的官僚结构，收入差距低，出口激励，工业化的成功，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相应的技术转移。“东亚模式”在国与国之间呈现“雁阵模型”，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减速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序时性。但作者认为，不同与东亚诸国，中国体量大，有自己的国情，所以应该找寻能够全面而系统性概括“东亚模式”结构特点的经济结构体系，进一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因此，作者参照前人研究成果，同时结合前人的综合指数构建经验，对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和城乡收入结构五个方面分别选取测度指标，并进一步使用算术平均法将五个结构指标合成为经济结构指数。然后，选取1999—2015年除四个直辖市外的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并根据地域特征将所有地级市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并且在不同区域下分别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探索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和城乡收入结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三、主要结论

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在全国样本还是东、中、西部地级市子样本中，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皆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中国经济整体和东、中、西部各区域经济增长都呈现出“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特征；

就东、中、西部而言，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尽相同，经济结构对于东部城市

经济增长已产生了抑制作用，发达的东部城市率先步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经济结构红利在中部城市正在衰竭，中部城市经济增长处于“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过渡期；西部城市的经济结构仍对经济增长发挥着一定的拉动效应，西部城市仍处于“结构性加速”的爬升期。

四、汇报点评

李老师认为，该文对重新认识“东亚模式”有启发意义，同时结合中国国情的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综合经济指标的每一个维度——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和城乡收入结构——对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现状都可以进行展开。本文的实证检验也很规范和标准，可以认真学习。

五、个人感想

东亚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关于“东亚模式”有大量的信息值得发掘和研究。中国属于东亚，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东亚经济整体的发展，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研究中国问题既要中国放在东亚视域中，更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值得学习。

实证模型其实并不用很复杂，能说明问题即可，关键的理论推导应当逻辑严谨，才能让人信服。